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熊吕茂

(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5-0619-06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他参加东西文化大论战的思想成果。这本书既是梁漱溟由佛转儒的标志,也是他成为当代新儒家开山人物最根本的证据。他在这部著作中明言放弃出家思想,归宗儒家,系统地阐明了儒家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提出了解决中国文化危机、描绘人类生活方案的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

一

在近代东西文化的冲突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失败的文化。其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国文化存在许多先天性的病症,这些病症表现为文化的幼稚性、文化的老衰、文化的不落实、文化的消极性、文化的暧昧与不明爽。若将这些病症归结为一点,可以说,中国文化的致命病根便是“不合时宜”的早熟性。“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1](258)}文化早熟就是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不合时宜的超越和跃进。在梁漱溟看来,征服自然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而强调与自然和谐,通过人的内心修养使人们生活在这种折衷的、没有冲突对抗的环境中,这是人类社会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唯有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后才能进入第二个问题的领域。因此,就

这一规律而言,中国文化应先解决征服自然,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问题,努力培养一种不断向外进取以求满足的人生态度,在有所成就之后才能进入第二个问题的领域。然而,文化早熟的中国却显然打破了常规,在未能妥善地解决物欲问题时就匆忙地进入到人心问题上,这无疑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中国文化既然是一种失败的文化,那么在遭到西洋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前,其出路又何在?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当一个民族的古老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时,它一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拒之于门外的做法,像中国的国粹派就将西方文化视为异端一律加以排斥,以此纯洁传统文化,在一种封闭的氛围中维护民族的尊严。另一种是全盘接受的做法,像中国的西化派就试图在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希冀中国会由此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在文化出路的问题上,梁漱溟又作何选择呢?

首先,梁漱溟不赞同国粹派的顽固守旧的文化观。他强调指出,西方文化有两样特长,“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2](349)}而这两样特长,中国文化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能一成不变的在这个世界上存续下去,它必须进行自我更新,作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于新文化运动领

收稿日期:2006-06-3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研究”(课题批准号:04ZC1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熊吕茂(1950-),男,湖南湘乡人,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领导人陈独秀等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梁漱溟表示了一种由衷的赞同,认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相反,梁漱溟对国粹派表示出极大的蔑视。认为他们的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只会“堆积一些陈旧古董而已”^{[2](531-532)}。

其次,梁漱溟也不赞同西化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及全盘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主张。在接受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方面,他与西化派有着同样的热情。但是,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本国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他与西化派又有着较大的分歧。梁漱溟认为,全盘西化派以中断文化的连续性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必须立足于旧有的文化环境,对旧文化加以辩证的扬弃,使之与新文化的合理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若对旧文化不作任何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失去活力,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但是,若完全否弃传统文化,全盘照抄照搬西方文化,这就会使中国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失去发展的方向。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既有着自己存在的社会根源,又有着自身所适应并与之发生作用的历史背景。因此,它不能被人为地分割开来,更不能被随意地移植到另一个文化环境之中。即使被移植的话,这种文化也会因其无根而丧失生命力,根本无法在异质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像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运动,一心想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推广西洋的政治制度,全不顾文化的承传性和不可分割性,结果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进程中,屡兴屡废,屡试屡败,究其原因何在呢?梁漱溟清醒地指出:这是“因为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而其梗阻则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而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渐渐凝固的传统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而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3](22)}全盘西化派对此置若罔闻,必然要遭受碰撞的厄运。梁漱溟认为,全盘西化派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危机,而只是把西方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全新的文化,将其引进到中国并推而广之,无疑要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历史事实表明,全盘西化的论调由于脱离中国的实际,因此,遭受失败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

梁漱溟在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历程中,已清楚地意识到西方文化所潜伏的巨大危机,并断定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本不可能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由此,他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主张,认为以人为中心、以折衷调和的人生态度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文化将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并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取代以物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将发生根本的变革,“由第一路向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由第一种问题转入第二种问题。”^{[2](493)}在梁漱溟看来,人类诞生之初,头一步问题是求生存,所有衣、食、住等种种物质的需要都要从自然界取得,所以这时的态度应当是向前要求的,就着前面下手,对外改造环境,以力求征服自然界,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近世以来,西洋人就是持这种人生态度,他们凭借着竞争的手段,通过与自然竞争、与人竞争、与整个社会竞争,终于在20世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满足人的物欲问题。当物的问题解决后,人心的问题便突出起来,而这时若仍然墨守成规,采取第一路向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第二个问题——人对人的问题,那必然就会行不通。“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人类渐渐不能承受这态度,随着经济改正而改造得的社会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而进为心的和同——总要人与人有真妥洽才行。”^{[2](495)}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开创了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时代,而欧洲现代社会的危机又预示着人生第一路向已走到了尽头,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新时期。同时,人类文化主体问题的转移,也预示着文化形态将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正好适应了这种文化变动的需要。由此看来,中国文化成为主导世界的文化,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2](525)}那么,究竟如何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呢?梁漱溟在文化选择的最终答案中,提出了他的文化研究的三点结论:一是“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二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三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2](528)}。

由此可见,梁漱溟在严厉抨击国粹派和西化派的文化选择的主张后,已不自觉地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即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否弃其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人生态度重新拿出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

西方文化,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两者不断冲突、不断整合后的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漱溟复兴中国文化的主张,及其为之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全方位的文化改造运动。在中国文化的重新构建中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表明,他既向往西方的全部文明成就,又不愿放弃中国天人合一、中庸调和的传统人生态度;既想克服乡村社会散漫、贫穷和愚昧的种种弊病,又不愿中国因此走上西方那种残酷竞争、人格异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这种充满艰辛的矛盾心态中,他只能走入一条自己设计且迎合自己矛盾心理的道路。

我们知道,梁漱溟的文化观是以唯意志论为哲学基础的,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把整个人类文化前景依人生三问题——生活三态度——文化三路向的公式顺次展开。梁漱溟认为:“人生盖有性质不相同的三大问题:1、人对物的问题;2、人对人的问题;3、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问题浅深次第昭然可睹。随着社会发史的阶段升进而人生问题顺序引入转深,实有其自然之势。”^{[1](653)}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的意志向外追求、征服自然,求得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其结果是理智发达,并带来了科学、工业、民主、法制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向外追求、征服自然的态度。梁漱溟认为,宇宙本来就是大生命,“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1](571)}。所以,认识生命首先要知道生命并不以个体为界划,个体只是生命意志本体的直接客体,一切个体都必须统一于世界意志。据此,梁漱溟认为,既然人我本来不分,因此解决人生第二个问题,即人对人的问题,意志就不能向外逐求,而应该“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2](382)}。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互相以对方为重,从而发展出伦理道德来。第三个问题的解决则更为幽渺。我们知道,个体生命的存在总是有限的,人生总有灵与肉的矛盾、身与心的矛盾。而意志总是渴望着无限伸展,精神总是企盼着绝对自由。因此生命意志要想超脱物质的拘扼,在梁漱溟看来,就只能“转身向后去要求”^{[2](382)},即通过禁欲主义的修炼来取消生存意志,这便是宗教。

梁漱溟认为,人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意志采取的方向决定的。但是为什么问题不同意志追求的方向也不同呢?这是因为,人的意志在向外奋斗、改变对象、克服障碍以获得自由的过程中,人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和需求,随着知识的增进,最终是可以满足的。人对他人的需求,由于“我意欲向前要求时为碍的在有情的‘他心’,这全在我的宇宙范围之外,能予我满足与否是没有把握的。……因为我只能制服他的身体而不能制服他的‘他心’。”^{[2](380)}而人们在人生第一个问题上的意欲得到满足时,必然会深切体会到第二个问题不能得到满足的痛苦,于是便调整意志方向,互以对方为重,折衷、调和、持中以达到彼此意欲的满足。然而,人又希望没有老、病、死,而这种意欲却是绝对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于是人便陷入心受到肉身限制的痛苦及人生无常的黯淡前景中,不得不根本反身向后要求,取消生命意志,以求无生之快乐。

以上就是梁漱溟描述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蓝图:人生三问题决定生活的三种态度,由此产生西、中、印三种文化类型,即分别以理智、伦理、宗教为特色的文化。梁漱溟认为,理智、道德和宗教三种文化现象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又是一个共时性的结构,即三者既有高低之分,在时间流程上来看,本应当顺次发生,但在空间上却又表现西、中、印三种文化的平行存在,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特征。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的‘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2](353)}所以西方文化贡献了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2](383)}中国人“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諧,——人自身是和諧的,人与人是和諧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諧的。”^{[1](131)}人互以对方为重,从而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所以中国文化向世界贡献了儒家伦理与道德。“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2](383)}。所以印度文化向人类贡献了至高无上的佛教。

问题是,原本应当顺次演化为三个文化阶梯,何以事实上成了平行展开的三大系文化?梁漱溟认为,人类之初都是朝着第一路向走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偶合以及天才的奇想,才诞生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样的早熟品。他说:“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

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原故。”^{[12](481)}同理,印度文化也是由于偶然的缘故过早地走向了不合时宜的人生第三路向。这样,梁漱溟的文化观就由唯意志论走向了偶然论和天才论。

三

由上可见,梁漱溟阐发西、中、印三种文化现象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他对世界文化的预言——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梁漱溟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虽处于落后与失败的态势,但并非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早熟而不合时宜。“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以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竞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2](526-527)}在这里,梁漱溟所阐发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但是它却展现了其东西文化观的具体内容。

第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是完全对的,我们只能无批评无条件地承认,并全盘接受。因此,引进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否则中国文化将永远会停滞不前。然而,梁漱溟并没有去深入地探讨这个当务之急,而是把着重点放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上。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病症源于机械,“机械实在是近世世界的恶魔”,机械化的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内形成阶级斗争,造成社会竞争激烈;在外酿成国家大战,造成世界灾祸不断。而所有这些,又都是西洋人意欲向前追求的人生态度与由理智发达产生的科学结合的结果。在梁漱溟看来,理智只不过是生活的工具,从属于人的意志和情感,而不能认识和把握流动的生命本体。他说:“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

所有之价值判断。”^{[1](97)}这里的所谓人生态度,就是指人的意志和情感。正是西洋人采取了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致使理智发达,个性伸展,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出现分裂,造成“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2](479)}据此,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实不可取的文化。

第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褒扬。他认为,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制度都几乎缺如,而且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就是中国人自由意识的不觉醒,安于天命,这是造成数千年封建独裁专制统治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梁漱溟对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这里专指儒家传统文化)进行了褒扬,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三点优长:其一,从物质生活方面说,中国虽没有西方那样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中国人“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2](478)}。避免了西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分裂的痛苦。其二,从社会生活方面说,中国虽没有西方的那种自我解放、个性自由,但是,“孔子的伦理,实寓有他所谓挈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总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2](478-479)}互以对方为重,到处充满了情趣,其乐也融融。其三,从精神生活方面说,中国虽没有西方那明细的科学和玄奥的宗教,但是“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2](480)}的境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梁漱溟在评价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中,对儒家的人生态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孔子的惟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2](458)}在梁漱溟看来,孔子这种不计较功利得失,不以外在事物为目的的人生态度,避免了意欲向外逐求的痛苦,使人生与宇宙大生命融而为一,趣味盎然,生机勃勃。同时,梁漱溟还认为,中国人“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本位的原则不应当仅局限于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应当扩大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即根据“互以对方为重”的原则,“站在团体一面必尊重个

人,而站在个人一面,则应以团体为重。”^{[1](95)}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德就能得以保存下来,中国人以往缺乏的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和尊重民主、强调纪律的精神也会随之产生。这便是人们称道的儒家理想主义。正是根据儒家理想主义的这种精神,梁漱溟预言,中国文化将可以拯救西方文化之偏失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兴。

第三,对印度文化的态度。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两方面不但不如西方,甚至连中国也不如。由于不合时宜的早熟,它“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2](393)}。这种状况的产生是由印度人意欲反身向后,即取消生存意志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然而尽管如此,梁漱溟却认为,这种畸形的宗教文化不但是最高最发达的文化,而且是人类的最后归宿。为了论证人类的这种出世归宿,梁漱溟认为宗教具有永恒性的特点。在他看来,生命意志就其本意而言,总是以追求维系生命和延续生命为旨归的,但是生命的本质却又是“无常”的,老、病、死是人不可改变的命运。因此,这一生活二律背反规律决定了人类天然具有出世的倾向,由此也就决定了宗教存在的必然性与永恒性。

综上所述,梁漱溟所阐述的“世界文化三期重视”说和“文化三路向”说,虽然其目的旨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指明道路,然而却缺乏文化人类学的依据,也不能真正解释东西文化的具体内容。

首先,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无法涵盖西、中、印三系文化的丰富内容。他所谓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要求”的根本精神,如果用来解释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和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精神还尚可说得通,但用之解释西方中世纪的文化就难以说得通了。因为西方中世纪的文化精神并非绝对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相反,它曾对人的个性伸展和科学的传播进行过残酷的压抑和摧残。又如他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调和持中”,遇到问题便随遇而安。然而,尽管这种人生态度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它决非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而是生活在农业文化和宗法伦理社会中所有民族共有的文化心态。比如俄罗斯民族自古便有这种生活态度,就是在近代文豪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也仍然表现有浓厚的“知足”、“安命”的生活色彩。再如素有西方精神之父之称的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生态度,与其说是向前要求满足欲望,还不如说是“意欲调和持中”更为恰当。

再看他所谓印度佛教文化“意欲反身向后”的根本精神,所持的是一种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然而,佛教也并非印度文化的全部。在印度上下近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佛教从建立到衰落却只有千余年的历史。况且古老的印度教(婆罗门教、耆那教)也不完全是禁欲的,马克思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4](143-144)}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难怪胡适在读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批评他的三个文化公式“‘整齐好玩’则有余了,只可恨那繁复多方的文化是不肯服服贴贴叫人装进整齐好玩的公式里去的”^{[5](116)}。

其次,梁漱溟的“文化三期重现”说也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广义而言)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反映着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控制自然和社会自发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方向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相一致的。因此,就其客观性而言,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发展一样,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梁漱溟的“文化三期重现”说是无法说明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其一,作为区分人类文化发展阶段标志的人生三大问题(人对物、人对人、人对自身生命)并不代表社会历史的三个阶段,相反,这三个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存在的,上古有之,现在有之,将来也必将有之。因为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与自然发生主客体的关系,而且要发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主体关系,同时还要发生人与自身生命的内在关系。这些关系问题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存在的,而决非“先后次第”出现的。其二,人生三大问题的解决也是互为前提的,它们相互联结为一个动态的结构系统。而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正是这一动态结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过程。因此,若将此三者割裂开来,社会历史和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其三,文化的历史性和继承性是以人类社会本体的统一性为前提的,若是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的“问题”根本不同,就谈不上继承与发展。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显然是漏洞百出的。他主张“意欲”对社会文

化的发展具有无条件的决定作用,无疑过分地夸大了人的意志功能。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和对中国儒家人生态度的推崇,以及企盼将中国人生态度与西洋文明结合起来,将中国文化改造成为全新的世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无不反映了他的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全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2] 梁漱溟全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 [3] 梁漱溟全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5] 罗荣渠. 从“西化”到现代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Comment on Liang Shu-ming's Idea of "Three Cultural Directions"

XIONG Lu-m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Liang Shu-ming put forward the famous idea of "three cultural directions" in his works of "th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and their philosophy" in 1921, asserted that the revival of the world culture would be the revival of China's culture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however, the revival of the world culture would not be the only revival of China's culture in the future, but the revival of the whole mankind civilization, which can only carry through the entire reconstruction to the whol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idea of "three cultural directions"; "th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and their philosophy"

[编辑: 颜关明]